

“法属北美”的轮廓与主权

弗朗索瓦·弗斯滕伯格 著 薛冰清 译



图1 雅克·尼古拉·贝兰:《北美地图》,1743年。“路易斯安那:欧洲人的探险与路易斯安那购买案”系列收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地理与地图部。

请看上面这幅1743年由法国著名制图师雅克·尼古拉·贝兰绘制的新法兰西地图[图1,雅克·尼古拉·贝兰、纪尧姆·德·厄兰:《北美地图》(Jacques Nicolas Bellin and Guillaume D'Heuland, *Carte de 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Nouvelle France*), 1743年。地图见 <https://www.loc.gov/item/2003627087>, 2003—06—27/2018—10—18]。该地图最初刊登在耶稣会士、旅行家皮埃尔-弗朗索瓦·沙勿略·德·沙勒瓦所著的六卷本《新法兰西的历史与概览》中,描绘了他所说的“这些幅员辽阔的国家,法国在此处拥有的领土,比其在欧洲大陆上还要多”[皮埃尔-弗朗索瓦·沙勿略·德·沙勒瓦:《新法兰西的历史与概览:奉国王之令赴北美游历的历史记录;奉国王之令赴北美游历的历史记录》(Pierre-François-Xavier de Charlevoix,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Nouvelle France: avec le Journal historique d'un voyage fait par ordre du roi dans 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第1卷,巴黎:皮埃尔-弗朗索瓦·吉法尔1744年版,第1~2页]。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它代表了当时法国人对这一地区的理解。因此,以这幅地图为出发点,有助于思考本文的主题——“法属北美”的轮廓。阅览沙勒瓦著作和贝兰地图的读者会发现,图中的“新法兰西”与今天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边界几乎没有重叠之处。从通常所描画的17—18世纪的法兰西帝国地图以及现代的教科书来看,它甚至与该帝国的轮廓也不吻合(见图2、图3)。

本文将对我所称的“法属北美”(French North America)作一番概述。我使用这一概念,是想同时区分开“新法兰西”和“美洲的法兰西帝国”。就我的理解,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来说,相较于现代的魁北克或近代早期的法兰西帝国,“法属北美”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很小。在不同的空间中,它有着显著差异:从纽芬兰海岸的渔场,到圣劳伦斯河流域的定居点,到五大湖沿岸的军事要塞,到伊利诺伊河流域的村庄,到密苏里河沿岸的毛皮贸易前哨,再到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奴隶制社会。“法属北美”也延

伸到加勒比地区,而且很有可能一直以加勒比为中心。尽管承认加勒比海盆的重要性(贝兰的地图明确显示了这一点),本文仍主要关注于大陆。

在这些多样性中,显现出某些共同的因素。在地理上,“法属北美”由水路构成,河流与湖泊将大陆上的广袤地区连缀在一起。法国主权的所在,全部集中在能够控制水路的战略要地。在人口结构上,“法属北美”主要是一个“法-印-梅蒂人的世界”(a Franco-Indian-métis world),它将不同的印第安政治体与法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世界联系起来。它的主要粘合剂不是政治或帝国,而是家族。位于核心的是亲缘网络(kinship networks),而非政治乃至经济上的效忠关系,尽管各种特性之间从来就难分彼此。这个世界不以欧洲的主权观念来定义,这说明教科书中的地图在本质上是真实的。准确地说,“法属北美”由种种真实和虚构的亲缘关系所界定,就其本质而言,这些关系很难被形象地表现出来,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强调的。

一 轮 廓

“法属北美”是一个以水为基础的世界,因河流、湖泊和海岸线而存在。我们可以将其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新月(或羊角面包?)。它发端于大陆架的边缘、北大西洋北部西侧的纽芬兰大浅滩。早在欧洲人移居北美沿岸之前,巴斯克、布列塔尼和诺曼渔民就在此处发现了丰饶的渔场,鳕鱼、鲱鱼、鲑鱼和其他海洋生物群集于这个远近闻名的生态系统。以这片海岸为原点,“法属北美”向西推进,穿过纽芬兰岛的海岸线,经过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至今仍为法国领土),跟随鲸鱼和海象进入圣劳伦斯湾。16世纪初,法国渔民就是在这里收获鱼油和腌制海鱼的[W.杰弗里·博尔斯特:《致命的海:航海时代的大西洋捕鱼业》(W. Jeffrey Bolster, *The Mortal Sea: Fishing the Atlantic in the Age of Sail*),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5、37页]。

17世纪初,法国移民开始尝试来此定居。魁北克城建立于1608年。殖民者继续溯河而上,1634年在黎塞留河口建造了特罗伊-里维耶尔,黎塞留河流域延伸至尚普兰湖和乔治湖,并深入到当时的易洛魁人领地。1642年,在古老的易洛魁村庄奥雪来嘉的遗址上,法国人建立了蒙特利尔。这里位于拉欣急流处,皇家山脚下,附近的平原风光若隐若现。横渡大西洋的船只逆流驶入圣劳伦斯河后,最远能到达此处。

圣劳伦斯河沿岸长期以来是“法属北美”的核心。毫无疑问,这是法兰西帝国在北美大陆的心脏地带,是法国王室能够行使真正主权的最大一块美洲领土。这里有一连串的移植欧洲制度的农业定居点,是典型的移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和萌发于大西洋沿岸、从新英格兰到切萨皮克湾的英属殖民地比较类似。新法兰西主要的经济、政治和人口力量都源自圣劳伦斯河谷,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区中心与边缘的动力分流至五大湖地区与密西西比河流域,越来越扩散开来。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到了18世纪后期,“法属北美”的大部分地区可以在政治上挣脱圣劳伦斯河谷,而继续生存甚至繁荣。放眼更大范围的“法属北美”,圣劳伦斯河沿岸的这些定居点更像是一个例外。

继续沿圣劳伦斯河上游而行,进入五大湖地区,圣劳伦斯河谷的特殊性就非常明显了。在这片所谓的“上游地区”(pays d'en haut,指五大湖周围、圣劳伦斯河谷以西的广阔土地。——译者注),法国殖民者明显只占人口的少数(在“法属北美”的几乎所有地方,情况也是如此)。法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主要局限在军事堡垒和贸易据点,它们建在战略要冲,包括尼亚加拉、底特律、密歇根堡和格林贝。“上游地区”也就是理查德·怀特笔下著名的“中间地带”。值得注意的是,该地不存在能够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独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印第安政治体。同时,此前几个世纪的巨大破坏,使这里形成了诸多的难民群体。由于没有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本土势力,因此这里得以立刻产生出一个以互为弱势和相互依赖(mutual weakness and mutual reliance)为特征的“法-印世界”。通过创造性的误解和相互的调适,催生了一个复杂、丰富、共享文化和经济的世界[理查德·怀特:《中间地带: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与共和国(1650—1815)》(Richard White,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1650—1815*),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几条路线连接起圣劳伦斯河谷的定居点与“上游地区”。最直接的途径是沿圣劳伦斯河上溯至安

大略湖与伊利湖,达到底特律的法国-印第安商栈。通往上游湖泊的几条贸易捷径则需要绕过这两个湖,同时正好绕开易洛魁人的领地。其中一条主要线路是由渥太华河向上,到达与马塔瓦河的汇合处,在那里经陆路转运(portage)抵达尼皮辛湖,再进入乔治亚湾。由此路还可前往另一条通道:经苏圣玛丽进入苏必利尔湖,再穿过伍兹湖直抵温尼伯湖(即贝兰地图上的“Lac Ouinipigon”)。蒙特利尔的商人可以通过这条路线,直接进入阿尼士纳阿比人、克里人和阿西尼波伊恩人收获颇丰的狩猎地,这些地方延伸至今天的安大略省、曼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塔省;还能再穿过“西海”(mer de l'Ouest,加拿大西部的多湖地区,法国人最初认为可能存在一片内陆海。——译者注),沿萨斯喀彻温河抵达落基山麓[W.J.埃克尔斯:《1534—1760年的加拿大边疆》(W.J.Eccles, *The Canadian Frontier, 1534—1760*),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1983年修订版,第145~146页]。其他的一些贸易线路从乔治亚湾出发,经过麦基诺,由密歇根湖顺流至底特律。

作为“法属北美”的大陆枢纽,五大湖地区是两大河谷、同时也是“法属北美”两大支柱的连接点。大湖区之所以成为地理的中心,部分源于连接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多个交叉口。最东边的陆路转运位于伊利湖的东南沿岸,连接了湖中的半岛与法兰西河、阿勒格尼河与俄亥俄河。不过,走这条路,旅行者要穿过塞尼卡人、特拉华人和肖尼人的领地,对法国商人及其盟友休伦人和奥吉布瓦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提议。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后两者与易洛魁人的战争就开始了,之后法国人也不断地牵涉其中。直到18世纪50年代,随着英国商人和定居者越来越多地涌向俄亥俄河流域,法国官员才做出回应,试图强化与迈阿密人和渥太华人的联盟,并且沿俄亥俄河上游的水道设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堡垒。

连接圣劳伦斯河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最直接路线,是途径伊利湖的西部边缘,即位于现在托莱多的出水口。沿莫米河逆流而上,到达今天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旅行者需经过一段8英里长的陆路转运,由沃巴什河进入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这是魁北克和新奥尔良之间最直接的路线,在贝兰的地图上,这条名为“瓦巴歇河”(Ouabache River)的交通要道一直延伸到伊利湖。这条路线确实非常重要,以至于早期的法国作家们会误认为俄亥俄河是沃巴什河的一条支流,是后者汇入密西西比河[雅各布·李:《中部水域的主人: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印第安部族与殖民野心》(Jacob F.Lee, *Masters of the Middle Waters: Indian Nations and Colonial Ambitions along the Mississippi*),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9页]。

在西边,几条较短的道路由密歇根湖而下,通往密西西比河流域。前两条连接了密歇根湖与法属伊利诺伊地区,其中之一穿过今天的芝加哥城,逆芝加哥河而上,转往德斯普兰斯河,再顺流而下到与伊利诺伊河的汇合处。这条路中的陆路转运有8英里长,只比密歇根湖的水平面高出15英尺。在多雨的季节,旅行者们甚至不用出独木舟,可以直接划过这些沼泽地带。另一条东边的道路连接了密歇根湖与圣约瑟夫河,经一段5英里的陆路转运,到达坎卡基河的源头,此河与德斯普兰斯河汇合,形成了伊利诺伊河。对毛皮贸易来说,最西边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路线,是经过密歇根湖的西部边缘,由格林贝沿福克斯河而上,抵达今天威斯康星州的波蒂奇。只需2英里便可跨过这里的分水岭,直接通向密西西比河的上游[威廉·克罗农:《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4页;艾伦·埃克特:《那黑暗而血腥的河流:俄亥俄河谷的编年史》(Allan W.Eckert, *That Dark and Bloody River: Chronicles of the Ohio River Valley*),第xxii~xxiii页;W.J.埃克尔斯:《1534—1760年的加拿大边疆》,第147页]。

在密西西比河流域,法国人的贸易网络遍布主要的河道。在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交汇处的下游,分布着各种各样的堡垒和定居点,作为进入大平原的“发射基地”。它们包括卡霍基亚、查特斯堡和卡斯卡斯基亚,充当了法国商人和传教士向密苏里河上游推进的主要节点。密苏里河是密西西比河最长的支流,一直深入到拉科他人、曼丹人和其他说苏族语言的地区[佩卡·哈马莱宁:《拉科他美洲:一部土著权势的新历史》(Pekka Hämmäläinen, *Lakota America: A New History of Indigenous Power*),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17世纪末,强悍的法印混血官员亨利·德·通蒂在阿

肯色河畔建立了阿肯色波斯特,用来保护法国人与控制阿肯色河下游的夸保人之间的贸易,并通过后者深入阿肯色河上游的贸易网络,一直到达今天的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凯瑟琳·杜瓦尔:《原住民的土地:大陆心脏地带的印第安人与殖民者》(Kathleen DuVal, *The Native Ground: Indians and Colonists in the Heart of the Continent*),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朱莉安娜·巴尔:《女性维系和平:得克萨斯边地的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Juliana Barr, *Peace Came in the Form of a Woman: Indians and Spaniards In the Texas Borderlands*),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其他的军事和贸易站点也战略性地坐落于河流水系的汇合处,从而确保从圣劳伦斯河到墨西哥湾的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友的内陆安全。

从“法属北美”腹地更大的发展动力来看,伊利诺伊河谷是个有趣的例外。那里有6个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混居的村庄,转向从事本土与欧洲的混合农业。作为“法属北美”的“粮仓”,这里同时种植玉米、小麦和饲养生猪。到18世纪中叶,该地区的非土著人口共有近一千四百,其中大多数是欧洲男性、印第安女性和他们的梅蒂人子女,以及遭到奴役的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引人注目的是,在伊利诺伊殖民地,非洲裔奴隶占有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使得法属伊利诺伊地区成为圣劳伦斯河流域与密西西比河下游的人口中间地带[塞西尔·维达尔:《法属伊利诺伊地区的非洲人与欧洲人(1699—1765)》(Cecile Vidal, “Africains et Européens au pays des Illinois durant la période française, 1699—1765”),《法属殖民地历史》(*French Colonial History*)2003年第3期,第51~68页]。

“法属北美”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核心区域,横跨密西西比河下游。17世纪末,差不多与法属圣多明各同时,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建立并开始断断续续地发展。新奥尔良建立于1718年,比魁北克晚了一个多世纪。但它发展迅猛,仅仅4年后就成为路易斯安那的首府,1721年时已经拥有约6000名欧洲移民,10年后又有了6000余名非洲奴隶。尽管死亡率极高,1732年时该殖民地的非土著人口仍超过5000,非洲奴隶约占总人口的65%[保罗·拉尚塞:“法属路易斯安那殖民地自由人口与奴隶人口的增长”(Paul LaChance, “The Growth of the Free and Slave Populations of French Colonial Louisiana”),布拉德利·邦德主编:《法属路易斯安那殖民地与大西洋世界》(Bradley G. Bond, ed., *French Colonial Louisiana and the Atlantic World*),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243页]。如果不是金融家约翰·劳的妄想最终破灭(指1720年密西西比公司的经济泡沫事件。——译者注),导致该殖民地成为法属大西洋的一湾死水,它很可能跃升为法兰西帝国的一大中心。随后,这里成为欧洲贸易网络中的边缘地带,却也因此带来了与当地印第安人的重新联系。虽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人口灾难,1730年前后这里还有大约三万名土著人。尽管与加勒比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路易斯安那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本地的经济和外交网络,包括东部的贸易伙伴克里克人和乔克托人,以及西南部的各个小部族[丹尼尔·厄斯纳:《边疆交换经济中的印第安人、定居者和奴隶:1783年前的下密西西比河谷》(Daniel H. Usner, *Indians, Settlers & Slaves in a Frontier Exchange Economy: The Lower Mississippi Valley before 1783*),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但是,“法属北美”并没有止步于北美大陆[也就是18世纪法国人所说的“北美”(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法国在美洲的核心利益位于南方:能够为帝国中心提供巨大财富的蔗糖殖民地。塞西尔·维达尔尤其强调新奥尔良的重要性,因为它同时连接了加勒比地区与北美的其他部分。当然,跨大西洋航线本身或许决定了新奥尔良与安的列斯群岛的紧密关系,所有来自欧洲或非洲的船只在驶入墨西哥湾之前,都要在加勒比海的某个港口停靠。毫无疑问,正如近代早期法国移民和官员对地理的理解,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构成了一个单独的海洋空间,一片“西半球的地中海”[塞西尔·维达尔:《加勒比海的新奥尔良:帝国、种族与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形成》(Cécile Vidal, *Caribbean New Orleans: Empire, Race, and the Making of a Slave Society*),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

的确,法属加勒比地区的引力异常强大。其中心位于法属圣多明各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的海地。在18世纪后期,该殖民地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到1789年,圣多明各已不单是法兰西帝

国,而且是所有帝国里最为富有、最为高产的殖民地。此外,在小安的列斯群岛,法属殖民地还有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法国的加勒比诸岛为帝国的中心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财富,事实上,可以把整个“法属北美”都视为加勒比殖民地的附属物。法国的国家重心在 1763 年显露无遗,当时的法国外交官放弃了整个北美的领土要求,只为能够保住瓜德罗普这一个岛屿,而此岛甚至都不是其加勒比殖民地中盈利最多的那个。

尽管加勒比地区是更广泛范围的法属美洲的中心,尽管它与密西西比河下游紧密相关,但其人口、经济和地缘政治特征都迥异于我上文所说的“法属北美”。我们可以将其放在一边,继续关注大陆的动态。

二 主 权

在北美几大帝国的标准地图上,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主权区域被突出标示,它们横跨了整个大陆(图 2 和图 3)。这些地图显示,帝国控制了大片的区域。它们凸显了一连串堡垒中的法国军事力量,以及村镇和城市中的欧洲裔人口力量。但是,这些描绘明显扭曲了这片土地上的实际情况。如果说“法属北美”在加勒比地区的主要人口构成是非洲裔,那么它在大陆上的主体则是土著人。晚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法属北美”与其说是一个传统帝国,毋宁说是少数法国人和大量美洲原住民之间的一组联盟(限于篇幅和“笔谈”文体,这里不一一标注相关的研究成果)。



图 2 1750 年前后的新法兰西地图 (维基百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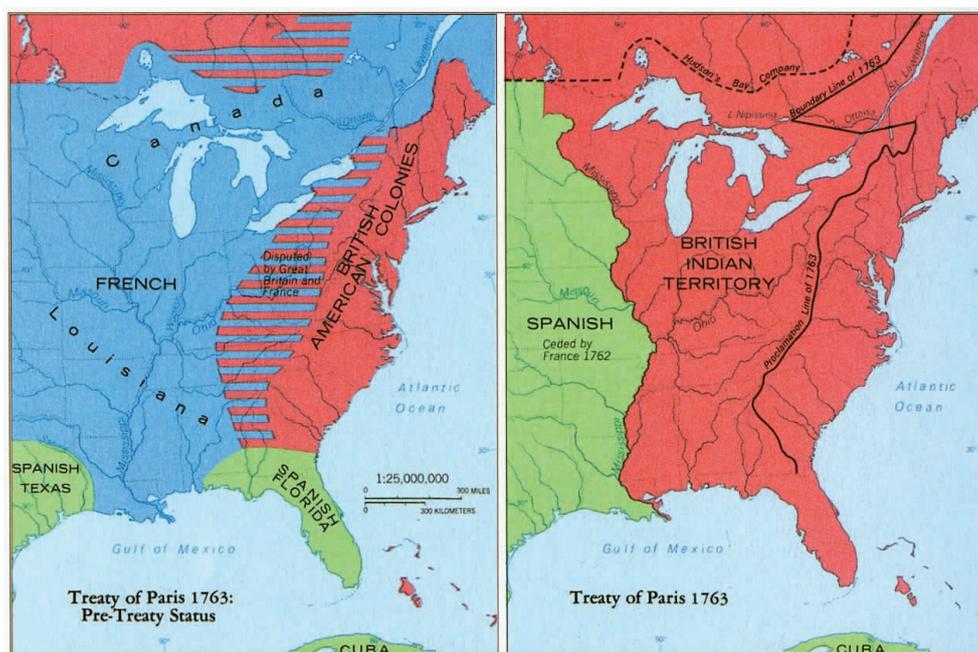


图 3 北美大陆的帝国转变[海伦·霍恩贝克·坦纳:《大湖区印第安人历史地图集》(Helen Hornbeck Tanner, *Atlas of Great Lakes Indian History*), 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如果说法兰西帝国的存在最为明显地体现为一连串的要塞和传教团,那么,“法属北美”的存在最富意义地体现在与印第安盟友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网络,包括商业、婚姻与纳妾、外交以及宗教等纽带。这些联系构筑起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印世界”,它不以政治或帝国关系为架构,而是通过家庭这个单位。这一世界的核心是法国男人、土著印第安女人及其混血后代即梅蒂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这个世界远远超出法国实际主权的有限空间。

虽然地域辽阔,但这是一个面对面交流占主导的世界。在这些不断伸展的空间里,关键性的水道和陆路转运构成了基础设施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也许正因如此,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常常会在令人咋舌的漫长旅途中不期而遇,而下一次的邂逅可能是几英里之外、数年以后。核心的家族、经济和外交关系可以跨越几代人,延续数十年。

再看看这些地图。想象一下法兰西帝国是如何抵御英帝国巨大的人口压力的:在这种压力下,一个帝国的色彩与另一个帝国的色彩相碰撞,然后突然翻转。地图上的色彩掩盖了如下事实:在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并不是法兰西帝国或法国军队成功抵挡了英国向北美内陆的扩张,抵挡它的是“法属北美”以及复杂而持久的亲缘关系和联盟关系。

如果说 1763 年后法兰西帝国从这些地图上消失的话,那么“法属北美”却延续了下来。事实上,在法兰西帝国灭亡之后,由相互连接的亲缘关系和贸易网络构成的“法-印世界”蓬勃发展,在 18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其重要性甚至越来越得到强化。如果说历史学家经常忽视这一事实的话,那是由于在长期支配历史书写的国族主义框架中,“法属北美”成了一个史学孤儿——它不属于魁北克、加拿大、美国或新西班牙的任何一方。在新法兰西覆灭于亚伯拉罕平原(指 1759 年英军攻占魁北克的战役。——译者注),并在《巴黎条约》的羊皮纸上割让该地之后,这个“法-美世界”依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

1763 年后,当西班牙帝国官员把触角伸入密西西比河流域时,凭借的是“法属北美”业已完善的基础设施。显赫的法兰西人与梅蒂人贸易家族将姓名西班牙语化,并与西班牙名门望族通婚交好。颇具灵活性的贸易与亲缘网络,就这样简单地环绕着新的政治上层建筑,继续生长。这些混合的贸易家族位居帝国中心,继续源源不断地从蒙特利尔和新奥尔良运来欧洲货物,输往印第安人所在的北美广袤内陆;甚至连法国军官也留在原地,如今以波旁家族另一分支的名义服务,并维持着他们与本地法裔和土著社群的既有联系。

即使在英属北美十三个沿海殖民地宣布从英帝国独立之后,这个“法-美世界”依旧延续。如果说大多数美国历史学家的注意力都朝向东部的国家独立之战,那么,一场与之有别的斗争也正在兴起,席卷了内陆的“法-印空间”。引人注意的是,俄亥俄河与五大湖之间的领土从来不是被美国军事力量征服的。不错,在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亨利的授权下,声名狼藉的乔治·罗杰斯·克拉克(“老西北部的征服者”)带领一小队肯塔基民兵向这里进军。他们声称夺取了伊利诺伊河谷的卡霍基亚、卡斯卡斯基亚和温森斯等城镇,但并非依靠任何的军事征服。这是该地区的法兰西人、梅蒂人和印第安居民的决定,他们欢迎这些作为盟友的美国人,而不是当作入侵者来抵抗[“老西北部的征服者”一词来自米勒·P.杜瓦尔的同名书籍。美国革命时期的战争经历,参见理查德·怀特:《中间地带: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与共和国(1650—1815)》和雅各布·李《中部水域的主人: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印第安部族与殖民野心》的讨论]。这种效忠转移的重要意义不能被忽视:它提供了美国后来获得该地区主权的正当性,同时也是在 1783 年承认美国独立的和谈中,英国放弃对这块领土要求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法属北美”的存在,如果它没有在 18 世纪 70 年代末心甘情愿地转向效忠美国,这一地区完全可能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命运。

在随后的几年中,老西北部成为美国第一块“边疆”。这里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出生地,也是其漫长职业生涯中常常写到的地方。在 1893 年的文章中,特纳将边疆定义为“浪潮的前沿——野蛮与文明的汇合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协会 1893 年年报》(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893),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 1894 年版,第 200 页]。如今几代人过去了,这种观点早已被取代。没有哪位历史学家会严肃地声称,在特纳想象的分界线的那头,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不过,对存在于特纳“边疆”另一侧的世界,已有研究仍未完全把握住它的轮廓。

特纳“边疆”之外的世界,并不只是一个原住民的空间。在美国开始强化对这片领土掌控时,一个“法-印世界”早已存在了近两个世纪。混合的病菌、有形的商品、跨文化的交际、性和家庭的关系,这

个世界以一种混杂和混血(hybridity and métissage)的方式呈现。即使在美国强行实施主权之后,在“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之后,在1812年战争之后,甚至在美墨战争和美国内战之后的许多地区,这个世界依然持续存在着。事实上,在早期阶段,美国主权的进入不单依靠定居者的财产诉求和军事力量,而是通过这个早已存在且长久以来构造了巨大空间的世界。和此前的多股势力相类似,主权的获得需要运用本土和帝国双重方式,即通过彼此联系、跨族通婚,同时借助暴力。如果我们仔细留意这一点,就会发现在美国扩张的每个阶段,征服的过程都伴随着这种混合性。

在跨越密西西比河的第一阶段扩张中,美国通过与法兰西商人及其印第安盟友结盟,从而将触角伸入这片领土。著名的舒托家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以圣路易斯为中心的网络为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旅行提供便利,在毛皮贸易中充当美国的经纪人,支持美国的外交行动,并最终成为驱逐印第安人的主要代理人。那些派驻新奥尔良和圣路易斯的美国官员和政府人员颇具雄心,很快便与法裔望族结为婚姻,缔造联盟,从而为一个新的帝国架构铺平道路,一如此前的西班牙官员。这些新的政治和商业网络逐渐使该地区疏远了与蒙特利尔、巴黎、伦敦和马德里等商业和政治中心的联系,转向纽约和华盛顿等新的中心[参见杰伊·吉特林:《资产阶级的边疆:法兰西人村镇、法兰西商人和美国的扩张》(Jay Gitlin, *The Bourgeois Frontier: French Towns, French Traders, and American Expansion*),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在政治和帝国的边界不断变动的同时,显现出某些经久不衰的连续性。地理永远至关重要。遍及内陆的城市和村镇最初建立在战略要地,滋养了“法-印世界”并存留至今,如新奥尔良、圣路易斯、韦恩堡、托莱多、底特律、芝加哥,以及更多的地方。但最为重要的,是位于这一世界核心的亲缘关系。它以一种极为持久的方式,滋养了经济、政治与宗教的联盟,远甚于任何残暴的帝国或军事力量。相互联系的家族网络深入广袤的内陆,沿河流上下,穿行湖泊,经过港口城市。简单的红蓝色块常被用来代表17—19世纪这一地区的主权归属(见图2、图3),相较之下,这些家族的动力实在难以用图像呈现。事实上,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也许正因为它们难以被表现,才会更加持久。以坚实的地理和亲缘纽带为基础,这个“法-印世界”才能在不断形塑该地区历史的巨大断裂中幸存下来,并且发展繁荣,历经本土、法国、西班牙和美国主权的正式更替。

有人甚至会说,“法属北美”呈现为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而帝国的故事甚至包括美国的故事,只是浮现于大陆历史的最表层,即“事件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的确,用布罗代尔的术语来描述“法属北美”的历史是非常恰当的。最底层同时也是最深处的历史,是人与其周边环境的关系这一“几乎静止的历史”,“是所有变化都极其缓慢的历史,是经常反复和不断循环的历史”。或许有些矛盾的是,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类似,“法属北美”的大陆历史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在历史的第二个层次,家族故事的“社会史”(histoire sociale)表现得最为丰富多彩,这是有着“根深蒂固力量”的“群体和集团的历史”[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沙恩·雷诺兹译:《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 by Sian Reynolds)第1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诚然,“法属北美”经历了异乎寻常的帝国转变与变形,但从某个视角来看,这些变迁很像是布罗代尔所形容的“事件史”或基于事件的历史,即“表面的扰动,是强劲历史潮流掀起的波浪的泡沫。这是短暂、迅速和剧烈波动的历史”。但是,布罗代尔提醒说:“我们应该学会质疑这种激情仍在燃烧的历史……轰动的事件往往只是更大运动的瞬间爆发和表面现象,而且也只能用这些大的运动加以解释。”(同上,第21页)

的确,如果我们观察得足够仔细,那么,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或许仍然可以一睹“法属北美”这个“法-印世界”的深层历史。

收稿日期 2019-05-05

作者佛朗索瓦·弗斯滕伯格,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译者薛冰清,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上海,200433。